

引言：人生的定位

在人生的历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找准自己的定位很不容易，但又十分重要。

定位是人生的开始，也是人生的选择。选对了，事半功倍；选错了，不光一事无成，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有些人并非能力不强、社会关系不佳或工作不认真，恰恰相反，他们本来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获得灿烂的成功，但只因为选错了方向，结果越努力输得越惨。

改革开放以前，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很难自由地去选择某个职业、某种行业，一切都是“服从分配听指挥”，捧上了铁饭碗就等于定了终身，没有改变的余地。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被确定为“实践”，而非某某人的指示。一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解放

运动轰轰烈烈地席卷中国大地。这时人们才开始逐渐地对自己的人生定位进行反思，有一部分人首先摔掉了“铁饭碗”，罢吃皇粮，走上了自谋生路的历程。我就是在此历史大潮下背井离乡，开始走上“改写人生”的坎坷之路。

我出身在江苏太湖之滨一个医生的家庭，爷爷和父亲都是基督教徒，均由教会培育他们上学和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一次次被批斗，上班下班挂着大铁牌子从医院走到家中，铁牌上赫然写着：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并用红墨水打上叉叉，路人避之不及。铁牌上的粗铅丝经常深深地陷入他的脖颈，留下深深的印痕。一个夏日的中午，乘路上没有行人，我忍不住踮起脚把父亲脖子上的大铁牌取下来，扔在地上，吓得我父亲连连摇手，马上弯腰拾起重新挂在脖子上，继续埋头弯腰在路上行走。我一边尾随一边发恨，又跺脚又抹泪，心里觉得父亲真像一头忍辱负重戴着轭把的老黄牛，为什么不知道反抗！！哪怕是悄悄的反抗。

回到家中，父亲把我拉到身旁，眼眶里掉下两颗黄豆大的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泪容，他哭着说：不挂铁牌，他们要打我……

这个“他们”当然是指工宣队，工宣队不光监管我的父亲，还监管我的生活，要我定期到他们那里汇报思想，并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母母亲划清界限。一连串的批斗和劳动改造最终将我父亲迫害致死，

临死前他甚至不敢转院出去治疗。他颤抖着说：转院治疗他们又会批斗我的……黑色的恐怖一直笼罩到他生命的终结。父亲的老实、忍耐、胆小在我心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我这一辈子决不能像父亲那样活得委曲求全，死得不明不白。我要堂堂正正挺直腰板做人！

我上的中学前身也是教会学校，取名“辅仁学校”，解放后改名为无锡市二中，在江南是极为有名的，曾培养出一批批文化和经济界名人。原中宣部部长王忍之，文化学者钱钟书，科学家钱钟韩，经济学家薛宝鼎，音乐学家杨荫柳等等均为该校毕业生。

我的先生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彼此跨越好几个年级，他的年龄比我大五岁，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我俩在插队落户时就彼此吸引。1974年他在苏北插队时调至县委宣传部工作，后被错打成“五一六分子”（一年后给予平反）。当时他只想凭借文学这一工具抒发自己孤愤的情怀和强烈的人生感悟，以便找到宣泄和慰藉。

1971年冬季，他风尘仆仆从无锡绕道东台找到我插队的苏北东台县梁垛大队（该大队离县城十八公里），想要我对他的新作提出一些批评修改意见。当时我已写成了一部长篇纪事长诗《一位女知青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位姓钱的女编辑找我联络，说准备出书，大家互相正好切磋探讨，那时懂文学、搞文学的同道者实在太少了！

我记得那天我正在大队参加社员大会，广播喇叭突然叫

喊：四队的女知青请立即回家，有人找！当时在大队部开会的几十名知青眼光刷地一下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人找，准是我的号。我未插队前就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下乡前家里整天一批又一批的客人，有年轻人，也有成年人，甚至还有老年人，他们都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结识的。在悠悠岁月中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学校里，永远有一群男同学对我表示特殊的好感，下乡后，他们甚至还一个个跑来看我。这次来的会是谁呢？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急跳。

走到知青组木窗泥墙的茅屋前，我才看到姐姐从厨房里跑出来向我招手，在她身后站着我现在的先生，（那时还只能叫笔友），他穿着一身的确良卡其中山装笑眯眯地望着我。

他是一位沉默、内向的男生，当时已有二十五岁，而我正好二十芳龄。我们所有的接触都非常严肃，正经，只谈文学，不说其它。即便以后谈起了恋爱，我们也从来没有手挽手逛过马路，肩并肩看过电影，所有的谈情说爱几乎都是在文学的世界里遨游，并且常常夹杂着清苦的中药味，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连爱情都变得那样“清真”。

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了两年，那时他已从苏北调到江苏南京的《江苏文艺》编辑部，任诗歌散文编辑。这时候他的生活面临一次抉择，要么在南京定居，那儿有他旧时的女友，要么调到无锡，与我成家。

不久，他的处女作诗歌《春风常驻十里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那时我父亲还没逝世，他首先发现了，把报纸

拿回来给我看，并感叹道：这个人若不能做我的女婿，我也情愿认他作儿子。我知道父母都很喜欢他，但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婚嫁，觉得自己实在太年轻。父亲也常对我说：一个女孩子应该先立业后成家，有了工作，有了安身立命的依靠才能谈恋爱。这句话我是充分接受的，所以我对他的等待视而不见，每次当他问我：我留南京还是调无锡？我总是没好气地冲他嚷：这关我什么事！平心而论，如果从他的前途考虑，我知道，他应该留南京，因为在那儿他可以进行专业创作，如果回无锡也许只能当个工人罢了。而他是那样醉心于文学，有时可以一口气写十几个小时，一连创作十天半个月。

在我没有表态之前，他的调动迟迟未办，他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我不忍再看他拖下去，终于寄了一封回绝他的信。他收到信后连日呕吐大病一场，后来从南京带着几箱豆油、几筐香肠和皮蛋（当时都是最紧张的需凭票供应的商品）送到我家，让我好好休养，并说：我以后不能来看你了，你要自己保重。说完，脸色蜡黄地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大哭一场。他的调动迟迟未办，我想我在人生路上没有知己了，至少在文学创作上没有笔友了。恰恰这时我父亲开始病重，三个月急救无效，一命归天。那时的我才二十二岁，因为照看父亲同时染上肝炎，虽然病退回城，但已一病不起。我觉得自己的人生道路变得如此灰暗和狭窄，除了治病只有吃药，还有什么作为可言？许多医生都对我说：小姑娘，认命吧，不要再想这想那的了。

这时候，他又悄然而至，再也不向我提求亲之事，只是每天来给我捣中药、煲中药，把中药递到我手中前总要亲口尝一下是否还烫嘴，默默地伺候我。我多半是自顾自睡觉，并不睬他，而他也就默不做声地在一旁一陪就是一天，晚上才赶去开夜车写稿。

有一次我忍不住了，问他：你调动的事办得如何？

他点点头，说：正在办，调无锡。

我一听，全明白了，他在执意等我。“你需要有人照顾”，他补充了一句。看来，生米煮成了熟饭，我已无法再拒绝。

为了调回无锡，他的档案寄了四次退回四次，但最后终于办成了。他也果真到无锡的一家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的配料工人。当时，编辑部的同仁都为他惋惜，同时又热烈祝福我们两位文学青年永结同好。

我们是在 1978 年结婚的，经过四年的治疗我的病终于痊愈，吃了四年的中药，中药渣如果凑在一起可以装一船，所以说我们的恋爱是在中药的苦味中浸泡成长的。

结婚后，我开始去一家工厂做会计，从零售会计、记账会计一直做到成本会计。由于不满足于企业枯燥无味的业务，我又参加市内广播电视局的招聘，以优异的成绩在三千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地电视台文艺部的一名编辑。当时考进广播电视局的有三十多人，而录取在文艺部的仅我一个，插队落户时搞文艺创作的经历这次帮了大忙。其时，我已出版过散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及评论多种，并成为江苏省作

家协会会员，全国散文协会会员。

记者、编辑的职业似乎十分风光，前途看起来一帆风顺，其实不然。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激烈，我走到哪里都容易成为“争议人物”。其时我先生已从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准备去海南创业办公司。

临走前，他与我彻夜讨论，去还是不去？当时，我坚决支持他去。如果不去，留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或其它文化部门当个干事之类的，其前途是可以估想的，但如果下海办公司前景无法估量，不管是好还是坏，正是这个未知数，才让我怦然心动。

我和我先生的个性中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喜欢不确定性，如果人生都在意料之中，都被计算好，什么时候发达，什么时候倒霉，什么时候老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毅然一致选择了风险性极大的目标——下海！文人下海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但成功的例子却不多。

先生下海之后，我的灵魂就像俄国的诗人莱蒙托夫在短诗《帆》里面所写的：“它不安地祈祷着什么，又不安地等待着什么……”我虽然在电视台干得并不赖，已经拍了几个电视剧，当上了电视剧导演，作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等等，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却无法平静地安于现状，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已不具备新的挑战意义，因为电视台的一切业务都是集体创作和合作的结晶，个人的努力更多地依赖于团体的协助，我觉得自己还有精力可以干一番更宏伟的事业。于是，调动工作至北京

中华文学基金会，并接受委托到广州开辟办事处。

原本，我可以在先生开办的公司内任职，那时他的公司风风火火，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但我意识到夫妇俩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实在是犯大忌的，互相关系不好处理，员工们也会有种种想法。而且，在广东沿海发生的许多家庭纠纷都使我明白，对一个女人而言，最有风险的投资便是男人！女人如果不投资在自己的能力、学识、人际关系诸方面，把所有的希望和回报都押在丈夫身上，她最后得到的不光是虚无还有失败。中国的女人都喜欢为丈夫，为孩子全身心地付出。我以前也曾经这么熬过来，结婚后支持丈夫继续创作，自己怀孕养孩子停止了文学上的探索，生孩子后又支持丈夫去北京读书，独自承担家务，抚养孩子，靠自学考试才得到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证书，但这种付出和回报其实是不相等的。

“因为你没有自己，所以也只能让人忘记你！”

在我离开电视台时，一位报社的女友曾经这么告诫我，而到了海南特区的所见所闻更使我相信选择自己，投资自己，才是最明智的。在现代社会中女性以自尊、自爱、自立才能赢得最稳健的回报。既然已南下，我想就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经营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编织自己新的人生。

主意打定之后，我要求中华文学基金会将我的工作单独安排。1990年我被任命为广州办事处负责人。

在广州期间，我遇到了中国的第一批“股评家”，那时他们都是央行的官员，在东京证券交易所考察后来广州授课。我

虽然未亲聆听课，但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深感到有一种新生而神秘的东西正在向我逼近——那就是中国的股票与股票市场！

潜伏在我血液和灵魂中的渴望冒险和拼搏的因子悄悄地萌动起来，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希冀和冲动。1991年5月我告别广州，抱着考察股票市场的念头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深圳，迈出了“改写人生”的关键一步。

一、我的第一桶金

在资本市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桶金，而且都是终身难忘的。许多人希望我将自己的“第一桶金”写出来与读者分享，我想这对于众多跋涉在投资之路上的远行者是会有借鉴意义的。思考再三，我终于决定提起笔，将这人生宝贵而难忘的“第一桶金”，也是我在资本市场的“初恋”，毫无保留地献给养育和培养了我几十年的社会和同胞。

我南下深圳进入资本市场是在 1991 年，当时凭着一种直觉感到新兴的股市充满了机会与诱惑，其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将比贸易与实业大得多，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原本是搞文学和新闻工作的弱女子而言，下商海不如下股海，当企业家不如当投资家，这是我一来深圳就抱定的宗旨。

打定主意之后我豪迈地对友人说：我到深圳不会去找工作，而要等工作来找我！深圳人当然以为我说这种话是心高气傲的吹牛，因为那时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内地精英分子如潮水般涌入深圳寻找机会和求职，而能如愿以偿的几乎为零。用一句股市中的俗语：中签率实在太低了！

为了进入这一行当我做了充分的准备：重新学习外语，重新学习经济学全套课程，将中外股市理论书籍搜索过来认真拜读。说来可怜，当时除了从香港买到一两本有关资本市场的理论书籍之外，国内有关这方面的读物几乎是空白，这也就使我们后来萌发了出版《股市通宝》第一套四本丛书的冲动。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较为优秀的股市理论书籍是美国彼得·林奇所著的《漫步华尔街》，这已经是 1993 年初的事了，而且就是这本书也是我死皮赖脸从一位朋友手中转买过来的。在此之前所能接触到的其它书籍几乎全是技术分析理论书籍，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技术分析派。

就这样，从 1991 年 6 月份来到深圳之后我在股市外徘徊了整整一年。这一年多时间我去过好多次证券部竟从来没有买卖过一张股票。一是囊中羞涩，当时除了吃饭口袋中空空如也；二是缺乏经验，不知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沿用一句朱镕基总理的话）；三是行情一直十分清淡，股价逐日走低，许多老股民都说“套得很深”，我想此时我既没能力又无资格去当“解放军”。

时间一晃到了 1992 年的 9 月份、大机会终于来了！证券

部门口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人头，街上的人个个都在议论股市，我在深圳惟一认识的女友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导我：现在可以买股票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在国庆节前的新闻联播里以喜气洋洋的口吻说：深圳和上海的股市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涨幅，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充满了信心，云云。我是每晚非常认真看新闻的人，看到这条消息之后一整夜没睡好。我惟一的念头是：党中央吹响了号角，明天我无论如何要去排队买股票，我要成为股民！

可惜当时是9月30日，开市要在国庆节后。我只有憋足一股劲——等待又等待，而且随着日子的飞跃，这种心情一天比一天迫切，仿佛失去这机会就要酿成我终身遗憾似的。光着急没用，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该买哪一只股票？

1992年的9月，深圳的股票仅六只，而且大都为房地产。从001到006，几乎每个股民都倒背如流，不像现在股票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根本记不清号码。当时的发展股已在20元以上，对我这个口袋瘪瘪的小股民来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其它如万科、金田、安达均在10元以上，当时最便宜的就数宝安，仅九元左右，对像我这样的“万元户”是最有吸引力的。当时我犯了许多新股民入市时最容易犯的毛病——拣最便宜的股票买入，一是觉得价位低，跌不到哪里去也就不危险；二是觉得所花钱不多，与自己的财力相当；三是认定人家肯定也会跟我一样想，以较少的钱买较多的股票。总之，低价股是散户的最好选择！这不仅是由散户的心理因素决定的，更是散户的经济

基础决定的，所以钱未出手散户其实已经站在了对自己不利的败方。大户和机构选股靠质地，凭理性，价位只是其次的因素，这样他们买入之后才可能较长时间地持有，最后形成这些绩优股持续地上涨。而散户选择的股票往往是“垃圾股”，“乌合之众”，众人追捧时无理性地飞涨，一旦树倒猢狲散，其股价可以一落千丈。我选择宝安股后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国庆节后开市第一天，早晨八点钟我便匆匆地赶到当时的深圳国投基金证券部，本以为自己去得够早，到了那儿一看，已是人山人海。当时的深圳仅五、六家证券部，每一家门面都十分狭窄，比米铺大不了多少。从我新开的股东代码号来看，深圳开户人数估计已超过二十万。二十万股民拥挤在五、六家证券部门口，那场面确实蔚为壮观，加上蹙足了劲的节后效应，不少人都怀揣着几张存折，抱着非买不可的决心去排队。

证券部尚未开张，人群像海浪般地一次又一次涌动，而每次涌动总是像大浪淘沙般地把老弱病残和妇孺之辈挤了出来，引起一阵阵吵骂。我耐着性子一次次地被推出队伍，又一次次地拼命加塞，只知道头晕脑花，两眼发黑。中午，离我还有五、六个人的时候，闭市时间已到，铁栅栏门无情地轰然倒下，把我和我当股民的一腔热情关在了门外。

下午烈日当头，人群里发出难闻的汗味和狐臭，熏得我一阵阵头晕目眩，我再也受不了了，心想倒不如明日一早再来排队，于是望着阳光下亢奋的队伍怅然而去。

第二天起得更早，一去那里人却更多，原因是昨日排队买

到股票的人今天都发达了，宝安股的股价也从九元直升到 10 元以上。还有什么比股票更好赚钱的？一夜之间深圳人似乎全醒悟过来了，股票的赚钱效应如无情的秋风扫荡落叶，把当时只有六十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市一下子唤醒了。这天的结果在意料之中：我又没能买上股票，而宝安股的股价已上了 12 元！

国庆节后的第三天，我下定决心，咬碎牙也要买到股票。由于几天的排队、气愤、焦虑，这一念头已越来越强烈，我甚至产生一种天真的幻觉：会不会在我排队轮上的时候，股票已全部卖完？一位排在我后面的老股民笑着说：这个顾虑没道理，股票市场有人买也总有人卖，有聪明人也有傻子，就像世界上有女人必有男人一样，你别害怕！听他这么说了之后我稍稍地安心，并且懊悔自己为什么国庆节后的第一天不叫那些农民工排个队，当时至多花上一百块钱，那么现在一股已赚了三块了！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舍不得铜板赢不了大钱，这也算资本市场给我上的第一课，因为我马上明白了为什么前两天我根本不可能排上队，因为那些大户掏钱雇佣的农民工早就把前十名占了，谁要请他们买股票，谁就必须掏一张百元大钞。这些农民工大都为乡党，一个人买完又一个挤上去。因而包括羸弱之我辈休想靠近窗前！每次收市之后，这些农民工数数口袋里被汗濡湿得可以挤出水来的钞票志得意满而归，不知他们有没有想到，那些叫他们排在前面一买几万股的大户赚的是他们的十倍甚至万倍？真是有多少智商赚多少钱，有多大的资本发多大的财，这个世界十分公平。

也许是股价升得太高了，也许是我想当股民的心太迫切了，也许是农民工看见我每天挤不到窗前已有恻隐之心，总之，在大汗淋漓排到第三天的十一时二十分我终于买到了 700 股宝安股票！价格为每股 13.70 元，总金额一万左右。老天有眼！如果再挤不上去我这天又白排了。看着中午关门后许多愤然不肯离去骂骂咧咧的排队者，我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了证券部。

等我下午再到证券部看行情时，我的心如一只吊桶一下子掉到了深井里。宝安股和其它许多股票一样在下午开市后往上短暂地窜了一下便直线下跌，人群里连连发出呀呀的喷叫声，排队买进的那一队呼啦一下子消失了，许多人反戈一击站进卖出的一队。

卖出的队伍越来越长，卖位的黄牛价已从 100 元猛涨到 200 元，是股价跌幅的几十倍，好多股民苦笑着搔头：炒股票不如做黄牛，卖位是包赚不赔的好生意。刚才还在埋怨股民比他们赚得多的农民工此刻万众一心地“霸”住了窗口的位置，使许多本来不想卖股票的人也呼啦一下拥上去，争取把刚买到一分钟的股票统统卖掉。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这一天宝安股从最高位跌了一元七角左右，我排了三天队好不容易买到的股票立即套牢了！——这就是当股民的代价。也许许多投资者都有类似我这样的经历，叫人哭笑不得又充满寓意的经历。

剩下的日子漫无边际而又痛苦，仅有的 10000 元钱被套住了，十一月份过去了，十二月份又来临了，股市一片萧条

杀，毫无起色。我一次次地到证券部去期望股价能稍微上来一点，哪怕亏一点点，我也要坚决斩仓出来，以后决不能轻易买股票了，我狠狠地告诫自己。然而，股市像泄了气的皮球，怎么拍打也不肯起来，投资者心灰意懒，证券部窗口的小姐与先生除了甩扑克已找不到“第二职业”。深圳是个移民城市，一近元旦众人归家心切，到底是持股过年还是持币过年，报纸上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注意到这些写股市文章的人被称为“股评家”，他们的口气权威而又严肃，像上帝在告诫自己的子民，不可以触犯天条。也就是说：不能在股市里干傻事。（虽然以后发现股评家干的傻事比股民还多，但当时我确实对他们充满敬畏之意，把这些文章看了又看，甚至有的还剪贴起来。当然，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正因为老一辈的股评家做的傻事比谁都多，所以他们仍然是最聪明的，确实值得敬畏。）记得当时这些文章都充满了对股民的抚慰，好像信徒得了病就会有教士给他洒一点圣水一样，鼓励投资者不要害怕严冬，并且充满信心地说：管理层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从那时候起股评家就承担了牧师和心理医生的职能。当时我看了这些文章真的很相信，我想：我们伟大英明的党既然让我们试验开辟股票市场，让我们大胆搞改革开放，哪有不付出代价的道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终于决定持股不抛，一股不卖，回家过年。本来准备乘飞机的，这会儿没钱只能乘火车了。

这段时间碰到那些经常去证券部的老股民，我非常虔诚地

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我的宝安已套了三元钱，总计亏损达 2000 元，跌幅 20%，该怎么办？有位四十岁左右戴眼镜的先生对我说的话让我记忆犹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没有尝过套牢滋味的人就不算股民。哪个人没有套牢过呢？如果你实在忍不住就卖掉一半留一半吧，这样升上去还有股票，跌下来你已走了一半，总算都可以交待。

当时我对这位先生的智慧十分认同，以后当我自己也成为股评家，看到有些人股票套了 20% 的时候，我便这么如法炮制开导他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最大最深者莫过于“中庸”二字，做股票当然离不开这一宗旨，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总是在走最少磨擦，最小风险的中间道路，这样往往失败和成功的概率几乎相等，也就犯不了大错，但同样成不了大事。所以有时候我又会悟到：中庸之道对于初涉股市者实属良方，但老于此道者对此却不屑一顾。证券市场计较的就是决策准确，看得准，敢下大注，否则又何来索罗斯与巴菲特呢？当然这是后话，当时对我辈初入股海者，这位先生的话还是有不无启迪的。我所以没有照此办理实在是因为资本太小，如果斩仓一半恐怕过年回来已无勇气开仓了。

熬到春节后回深圳，正逢邓小平同志南巡，银根已有明显松动，经济已有回暖迹象，我们久盼回升的股市却仍纹丝不动，好几次我都已经冲动地走到柜台前想把这 700 股宝安如贾宝玉的一头青丝斩了而去，但忍了又忍，终于不舍得。也许是新股民的这种恋股情结帮了我的大忙，从 2 月底开始股市终于